

《战时记者》初探

蔡 罕

摘 要：揭示抗战时期创刊于浙江金华的新闻专业刊物《战时记者》创办的历史背景与动因，介绍刊物出版的概况，分析该刊在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史、浙江新闻史与抗战史、战时新闻学等方面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战时记者》；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战时新闻学；杜绍文；汪远涵

作者简介：蔡罕，男，教授，历史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教务处，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1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5）02-0002-08

《战时记者》是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于1938年9月1日在浙江金华创办的重要新闻学期刊。由于历史的封尘，长期以来新闻学界对《战时记者》知之不多，研究甚少。但该刊是抗战时期与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武汉创办的《新闻记者》齐名的新闻专业刊物，它不仅是研究浙江新闻史的重要文献，而且对于研究“战时新闻学”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笔者对《战时记者》的初步研究，列述如下：

一、《战时记者》创办的历史背景与动因

1937年12月，日军攻下南京后又占领杭州，浙西（钱塘江以西以北的浙江地区）1市14县全部沦落敌手，浙江省府机关撤至金华，敌我双方隔钱塘江形成对峙局面，并持续到1940年初。故《战时记者》创办之际，浙江的抗战形势已十分严峻，部分浙江民众由此产生了消极的亡国恐慌心理。为了安定人心，动员民众，培养实力，以贯彻抗敌自卫的国策，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提出“政治上必须有一个崭新而为大众所拥护的政治纲领，作为政府与人民共守共行的准绳”。^[1] 1938年2月，浙江省政府率先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提出：“发动并统一全省文化界救亡工作”。实际上，早在该纲领颁布的前一个月，“浙江省文化界抗敌协会”就已经在金华成立。《纲领》的出台则进一步加快了金华成为浙江省的文化中心。当时金华不仅聚集了一大批从沦陷区撤出的一些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记者、编辑，同时也迁来或新办了许多进步报刊，成立了诸多抗战文化协会与团体。1938年4月12日成立的“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就是当时战时文化团体最先组成的单位之一。据统计，自1937年冬至1942年5月金华沦陷，“在此出版发行的报刊超过60家”。^[2] 这不仅使金华成为战时报刊的集中地、浙江的文化中心，也使浙江“成为东战场文化的长城”，^[3] 金华成为与重庆、桂林齐名的全国抗日战争后方三大文化宣传中心之一。

在举国共赴国难、团结抗日之际，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报纸同于武器，纸弹等于铁弹”，“报纸在抗战期中，负有神圣的后方和前方的任务，它的任务的完成，对抗战前途，有着无限的助力”，^[4] 提出要加强战时新闻与宣传工作的研究，加强对战时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从而使新闻宣传更好地服务于抗战这场民族解放斗争。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战时记者》作为一种新闻专业期刊在战时金华创办有其特殊的时代动因。

首先，国难当头，抗战形势的危急，需要新闻工作者勇敢地担负起抗战建国的神圣职责。《战时记者》创办于1938年9月1日，这一天正是民国“记者节”。在这样一个属于记者的特殊节日创办《战时记者》，其用意不言而喻。正如该刊创刊号“发刊辞”所提出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战时

记者要担负起“反侵略，谋自卫，求生存”的神圣职责。要“站在反侵略的第一线”，要成为“反侵略的急先锋”。^[5] 所以，《战时记者》的创办，就像是向全国新闻工作者发出的一声抗战集结号。

其二，抗战新闻事业的发展需要新闻从业者担负起“教员”的职责，为抗战新闻事业培养后备人才。日本的侵略，一方面造成了对中国新闻事业的破坏，但另一方面也催促着中国战时报刊事业的发展。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军事斗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加强战时新闻宣传的力量，使宣传与军事相配合。正因如此，中国的新闻事业在抗战爆发以来反而得到了“飞跃的进展”。就浙江而言，其“新闻事业不但不因军事上的影响而落后，反因军事上的需要大量的增加”。据当时统计，“在战前全省报纸不过四十七家，而战后却增到七十五家”。^[3] 快速发展的新闻事业，使得新闻部门“需要众多的后备员”，然而当时“训练后备员的教育机关却稀少得可怜”。“在新闻教育机关未能大量扩充之前”，就需要新闻从业员担负起一定的责任，要“以他们所获的经验，所有的学识，恳切地告诉那些准备走进新闻阵营的人”。这时，如果能创办一种刊物，“收集这些宝贵的学识经验，使站在新闻学大门之外的青年得到一点门径”，^[6]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战时新闻后备人员培训与教育机关不足的问题。《战时记者》创办的一个重要动因，正是要解决培养战时新闻宣传后备人员教育资源不足的困难。

其三，要从专业的角度研讨战时新闻与宣传，从而为战时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一个学习与交流的平台。抗战开始之后，许多战时新成立的机关团体都设有专事宣传的“科组或人员”，但是他们往往缺乏经验，“想多找一点可供参考的资料”，“很需要一个可资探讨的场所，使宣传的效能得以增加，使攻心的收获借以扩展”。^[6] 《战时记者》作为一种新闻专业期刊，就能为战时宣传人员起着提供学习资料库与交流研讨平台的作用。

其四，要帮助民众了解时局，提高民众的媒介素养。抗战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这就是“地方报纸获得最佳的扩充机会”，就连“荒乡僻地都可发现各种各色的报纸”，其结果是“向不关心时事的人也都津津有味地谈着抗战局势与国际大事了”。但是由于限于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大多数人阅报都是囫囵吞枣不能完全了解一件事情的始终的”。也有“许多人因阅报不得其法而渐渐失掉了对于报纸的兴趣”，因此，“他们迫切的需求有解答他们疑难的场所，鼓起他们研究时事的兴味。”《战时记者》创办之时，就没有定位成仅供少数记者们阅读的“专门的刊物”。相反，它将读者的主要对象定在“非记者”的普通人群，其办刊目标就是“叫读者们了解新闻工作的情形，叫读者知道宣传的究竟，叫读者明瞭阅报的方法”。^[6] 从我们今天看来，就是要提高读者的媒介素养，从而增进抗战宣传的社会功效。

二、《战时记者》之概况

（一）《战时记者》的创办与刊出

《战时记者》由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于1938年9月1日创刊于金华，社址位于金华塔下寺前街第19号。

《战时记者》为月刊，每月一日出版，面向国内外发行，先后由金华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浙江支社（时设金华西市街）总经销。首卷从1838年9月至1939年8月共出12期；第二卷从1839年9月至1940年8月亦出12期。其中，编至第6期的时候，“萧绍突告吃紧，预备发排的稿子只得重新封存起来”，一直到1940年4月，战事稍缓，才“将二卷六、七、八三期合刊出版”。^[7] 第二卷第11期（1940年“七月号”）因“奉令与金华出版之各刊物合出抗战三周年联合刊”，故该期《战时记者》没有单独出版；第三卷2、3、4期为合刊。1942年1月因与“金华出版各刊物合出元旦特刊”，故此期即为《战时记者》三卷第5期。目前，我们能够看到《战时记者》的最后一期是1942年2月1日出版的第三卷第6期。这一期是否为该刊的终期，尚未定论，但可以肯定，这离该刊的终期已不远了。因为

这一年5月中旬,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5月29日金华失陷,在此之前婺城的报刊都作出了或停或迁的决定。

《战时记者》办刊期间,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能坚持四个年头进行新闻专业刊物的出版实属不易。正如该刊《二卷献辞》所说的:“《战时记者》随时有夭折的可能,经济的窘迫,稿件的缺乏,负责的无人,印刷的困难……,具备其中一项,即有停刊危险,何况《战记》兼而有之呢?”^[8]《战时记者》当时“经济的窘迫”,我们从该刊的售价情况可见一斑。《战时记者》首次标明售价的是首卷2期,“零售四分,预定半年,售价二角”。1939年4月,《战时记者》于首卷第8期更改售价为“每册五分,半年连邮共三角”。此价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40年4月该刊于二卷6、7、8期合刊上刊出“重要启示”,告知读者由于“成本日趋高昂,亏耗未免过巨,迫不得已,酌增售价”,提出“自二卷六期起每期零售壹角,预订半年五角”。^[9]目前所见《战时记者》最后一期(三卷6期)标明的售价是“本刊零售每册二角,外埠另加邮费”。这个零售价是该刊创办时的5倍,一年前的2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当时金华物资(包括报刊用纸)的紧张与物价的高昂,也反映出“经济竭蹶,印费剧增”给《战时记者》所带来的困难。尽管如此,《战时记者》杂志社的同人“由于一股磅礴的精神所孕育、所驱使、所感召”,“虽在敌机的狂炸下,在谣言的纷起时,在困难的交煎日”,以“有恒”之决心,使这份刊物按期出版,从无疑误。^[8]这种坚忍不拔的事业心,是当时浙江新闻界奋力抗敌自卫的一个写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战时记者》的创办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除了惠赐文稿,有的还帮助《战时记者》设计封面。比如,首卷第9期封面为艺术家姚思铨先生“惠绘”。首卷第10期之封面为名画家俞乃大先生之大作。丰子恺先生也将其漫画寄给该刊,作为首卷11期的封面。许多读者还以热诚表扬、恳切鼓励的来信,希望《战时记者》办得更好。

(二)《战时记者》的编者、作者与读者

1.《战时记者》的编者

《战时记者》先后有两任主编——杜绍文、汪远涵。前任主编杜绍文,广东澄海人。他于1927年考入复旦大学,在学期间(1930年)就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新闻政策》一书。1931年大学毕业后一度留校任助教,同年9月,在江苏镇江担任《苏报》记者兼副刊编辑。后任杭州《民国日报》国际新闻版编辑,兼任资料室主任,以及《东南日报》主笔。杭州沦陷后,他随东南日报社迁金华,不久担任《战时记者》主编。1940年1月,杜绍文赴湖南任职。由此推断,杜氏主编《战时记者》的最后一期应是第二卷第4期。离任前他“曾再三嘱咐”同人要把刊物坚持办下去,“决不能中途而废”。^[7]在继任主编没有推定之前,由汪远涵暂时负责该刊,“藉作过渡”。所以,《战时记者》第二卷第5期没有标明“主编者”,只是以“本刊同人”的名义发表了《勇往迈进之第三年》。汪远涵作为“主编者”第一次是出现在第二卷6、7、8期合刊上。这也就是说,汪氏正式担任《战时记者》总编应从1940年2月起。

汪远涵,浙江温州人。1931年考入复旦大学文学院新闻系,1936年春毕业,并以文学院毕业成绩第一名获得学校银盾奖牌,同年任上海《时事新报》国际编辑。1939年9月进入金华版《东南日报》,担任栏目主编、编纂课长兼评论委员会委员。^[10]1940年1月,汪远涵接手《战时记者》之时,正是日军偷渡钱塘江,攻占萧山、绍兴,直接危及金华之际。因此,他受命于危难,力撑时艰,坚持《战时记者》的出版。尽管他作为主编的第一期,是以6、7、8期“合刊”的形式出现,打破了该刊以往“不延期”、“不合刊”的一贯方针,但是在这“不可规避的横逆中”能维持出版,其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应该说,汪氏接任《战时记者》主编后,其所遇到的困难比前任更大。由于“一年来纸张油墨等的大涨特涨”,《战时记者》的亏损日增,在“无雄厚的财力可恃”的情况下,汪氏不得已做出“提

高售价以资弥补”的决定。但是,《战时记者》的办刊质量和社会影响在汪氏手中并没有减弱,作为主编,他坚持《战时记者》一贯的办刊宗旨,十分重视读者来函所提出的意见与要求,“对于许多有价值的指示”,“自当遵办”。笔者以为,杜、汪两主编实是《战时记者》的顶梁柱,他们对该刊在战争环境下能坚持出版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另外,我们也看到,《战时记者》读者的来函、作者的来稿都要求“径寄浙江金华东南日报社转战时记者社”。^[11]由此,笔者推断《战时记者》的社址“金华塔下寺前街第19号”很有可能与金华版《东南日报》的社址——“婺城塔下寺蒋氏宗祠”^{[2](177)}是同一地方。在1939年9月东南日报社遭敌机轰炸迁至城外的望府墩之前,两社应在一地合署办公的。正因如此,《战时记者》的主编与编辑部的同人主要来自当时东南日报社的骨干人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于《战时记者》的编辑工作“都是纯尽义务”的。

2. 《战时记者》的作者与读者

《战时记者》的作者大体上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理事与成员。由于该刊是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会刊,所以学会的理事与成员(以《东南日报》为主的浙江国统区的报刊、通讯社的主要编辑与骨干记者),就构成了该刊作者队伍的主要力量。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理事中,杜绍文、钱震、朱苴英、王遂今、严芝芳、许士龙等理事,均是《战时记者》的主力作者。作为战时浙江地方性的新闻学刊物,当时在金华、丽水、兰溪等地的报刊、通讯社的编辑、记者,以及政府教育文化部门的人员等对《战时记者》文稿的贡献尤多。比如,《东南日报》总编辑刘湘女、编撰科长金瑞本、编辑钱谷风、战地记者李振茂、《抗战论坛》主编骆耕漠、《浙江潮》主编严北溟、浙教文委会干事孟锦华、兰溪《新民报》主编邵鸿达等都在《战时记者》发表过多篇文章。

第二部分是该刊的特约名家。《战时记者》曾在首卷第8期刊出“好消息”：“本刊现经请定新闻界先进朱应鹏、郭步陶诸先生,新闻学名作家范长江、胡道静先生等多人,分任本刊特约撰述,按期撰稿。”^[12]在这些特约名家中,胡道静对《战时记者》的贡献最为卓著,他给《战时记者》写了不下12篇的文章。

第三部分是当时新闻学界、业界著名的学者与专家。《战时记者》创办后,得到了当时新闻学界、业界,以及政界的广泛关注。在盘点《战时记者》的作者时,除了上述特约的新闻界先进,笔者看到了民国时期一系列新闻学名家的身影。譬如:当时重庆《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常务理事、桂林《扫荡报》总编辑钟期森,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曹聚仁,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教授赵敏恒,以及复旦新闻系教授赵君豪、王文彬、祝秀侠、副教授王研石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姓名,如白崇禧、李宗仁、郭沫若、恽逸群、胡愈之等。《战时记者》有如此精英的作者群,足以说明该刊的社会影响。

第四部分是该刊的读者与一般投稿者。由于《战时记者》的取材,一方面是有关新闻与报业学理的专门文章,另一方面又是战时各方的动态速写,故其内容呈现出“专门和通俗打成一片”的特色,既符合了报人在战时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使“新闻从业员固高兴看”,同时也满足了普遍读者对战时新闻宣传与报业的兴趣爱好,使“各阶层的人亦高兴看”。^[13]正因如此,《战时记者》的读者群包括了新闻从业员、新闻学者和民众中对于报业有兴趣者。这就使得该刊的读者与作者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一些喜欢阅读《战时记者》的读者往往就成了该刊经常投稿的作者。比如,浙江於潜地方报的编辑华封,就是由于在书店里见到“渴望已久的《战时记者》”,才由一名读者成为该刊的作者,《战时记者》先后刊登了他写的3篇文章。同时,也有许多新闻学者,“无代价的”给刊物“经常写稿”。^[8]《战时记者》作为新闻专业刊物能够在战时坚持出版近三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读者的稿源

与精神上的支持。

此外,《战时记者》中还有少数外国人写的文章。譬如:罗果夫《苏联新闻事业概况》(一卷6期)、塔布衣夫人《一个法国女记者的信仰》(三卷2、3、4合刊)等,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战时记者》作者队伍之广。

(三)《战时记者》的栏目与内容

《战时记者》的办刊宗旨是“旨在研究新闻学术,加强战时宣传”,^[9]要成为“战时喉舌,记者园地”。围绕这个办刊宗旨,该刊设置了一系列栏目,现将主要栏目及内容介绍如下:

1. 社论

《战时记者》每期首篇均发表有关战时新闻与宣传,以及抗战救国、声讨敌寇的“社论”。在这些社论中,主编杜绍文写得最多。从创刊号开始,杜绍文就连续发表了《记者节与反侵略》等18篇文章,直至他辞离该刊。汪远涵接任主编后,也写有《发扬记者精神》等社论。此外,还有梁寒操《我对新闻界的希望》、彭国栋《新闻国营论》等文章。这些“社论”不仅体现了该刊主编的新闻学观点,而且也反映着当时新闻界、政界对战时新闻事业的观点与态度。

2. 新闻的新闻

“新闻的新闻”是《战时记者》办得最有特色的栏目,所刊“多关于报人生活消息,与工作经验心得,富自我教育性”。^[14]故其内容主要是新闻业界、学界的动态消息。该栏目内容丰富,战时新闻界各方(包括敌方)的消息它都给予了及时的报道。

3. 专题笔谈

“专题笔谈”始见于首卷第3期,它是《战时记者》邀集各方人员就如何推进战时新闻事业,探讨抗战救国之策等问题展开专题研讨与笔谈的栏目。当时关注的专题有“报纸和民众怎样联系起来?”“战时报人如何贯彻所负使命?”在1939年到来之际,该刊推出了“如何达成‘新的开始’”专题笔谈,研讨了抗战局面如何“有一个新的造就,新的展开”;报纸和报人“如何追求新的事物”;新年到来之际,“应该有新猷的呈现”。^[15]此外,《战时记者》在二卷第2期还专门就“报人健康问题”邀约相关编辑、记者进行了专题笔谈。

4. 记者常识讲座

“记者常识讲座”始于首卷第4期。首开一讲,是时任浙江国民通讯社社长朱直英的讲座,题为《怎样做一个优秀的外勤记者》。以后又有金瑞本的《编辑新闻的技术》(首卷5期)、王纪元的《报纸版面的研究》(首卷8期)、黄需的《新闻记事的结构》、沈沉的《怎样写通讯》(首卷9期)、左丁的《怎样办墙报》(首卷11期)等。第二卷第1期后,该栏目改为“记者知识讲座”,刊登的是胡道静撰写的有关“中国新闻起源史”的系列文章。

5. 报史专栏

《战时记者》首卷第9期曾推出“报史佳话”一栏。尽管“报史佳话”栏目的名称始见于首卷第9期,但是报史专栏却早已存在。从该刊首卷第4期起,就陆续刊载了一系列有关中外新闻报业史的文章。在报史专栏的作者中,胡道静是最主要的一位,其有关中外新闻史的文章,不仅自成系列,而且知识性、学术性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记者》作为新闻学专业刊物的学术品位。

6. 通讯与问答

自首卷第8期起,《战时记者》特设“通讯问答”(后改“通讯与问答”)一栏,“读者对于新闻界或新闻学如有任何问题,均可来函询问,当用直接答复或公开答复方式,详为解答;如需面谈,亦可照办”。^[12]“通讯(与)问答”开设后,主编杜绍文在每一期都亲自给读者、作者答复有关问题。这对于沟通读者、增进读者对该刊的了解、满足读者的需求等方面,均起着较好的作用。

7. 广告

作为抗战时期创办的新闻学专业期刊,《战时记者》的广告也有自身的特色。从其内容来看,可分为两类:一是捐助抗战的广告;二是有关新闻书刊、抗战书籍的广告。该刊除了长期为《东南日报》和《正报》做广告外,还为范长江新著《新阶级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团结运动》、郑棣《抗战画集》等做过广告。

8. 国际时事

《战时记者》自创办以来就很重视对国际时事问题的研究。创刊号上就推出了“国际时事问题之解剖”的专题,约请《东南日报》编辑许士龙、王遂今分别撰写了《日苏间为什么会休战?》、《捷克怎样做和平堡垒?》等文章。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接办时事研究会后,《战时记者》于二卷1期特拟“时事问题研究大纲”,并罗列了1939年9月份的论题要目:(一)当前世界大势的概观;(二)爱好和平国家应战力量的雄厚;(三)两个阵营实力的估计;(四)假如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栏目的文章对于国人了解与探讨国际时事均起着一定的作用。

9. 无冕斋随笔

“鬼谷子”主持的《无冕斋随笔》(原名《无冕斋谈荟》)是《战时记者》创办以来每期的固定栏目,主要刊登一些杂文、掌故、随笔等等。“鬼谷子”为谁尚不可考。其文貌似谈古论今,但其意不在文史品评,而是将笔锋指向倭寇、汉奸,多给人以民族正气之感。

除了上述栏目,《战时记者》还充分利用“补白”进行抗日宣传。“补白”的文字不仅精简,而且生动引人,好懂易记,富有传播力。除了文字,《战时记者》还利用漫画进行版面的“补白”,二卷第一期中就有《“汪先生”的文房四宝》漫画,此画作为“本刊特辑”《展开消灭汉奸报运动》一文的“补白”显得非常贴切,图文结合,也提高了阅读的趣味。

三、《战时记者》之研究价值

拂去历史的封尘,当《战时记者》这份七十多年前的新闻专业刊物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浙江的新闻工作者以刀为枪、奋起抗战救国的动人景象,同时也不难看到这份刊物弥足珍贵的研究价值。

首先,《战时记者》具有新闻史、抗战史的研究价值。作为抗战时期创刊于浙江金华的一份新闻专业刊物,其本身就是抗战时期浙江新闻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学界关于浙江新闻史的研究都没有涉及这本刊物,对于这份刊物的主办单位——“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也很少有专门研究,因此研究《战时记者》可以填补中国新闻学术史,尤其是浙江新闻史研究之阙。作为新闻专业刊物,该刊也刊载了诸多有关抗战时期我国新闻报刊事业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了当时社会各方的媒介,既反映了国统区的新闻事业,也揭示了沦陷区的报业情况,既有各国通讯社在香港的情况,也有晋察冀边区新闻事业的实况,在今天看来,这些文章均已成为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

另外,《战时记者》“新闻的新闻”栏目中的短小新闻,以及当时记者所采写的通讯报道与相关文章,也成为今天研究抗战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比如,《东南日报》记者李振茂所写的战地通讯《血喋海盐城》(创刊号)报道了海盐“三度沦陷”的详细经过、《最后留杭五日记——纪念省会沦陷一周年》(一卷5期)一文,作者则回忆了杭州沦陷前的亲身经历,这些文章都是研究浙江抗战史极其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其二,《战时记者》是研究“战时新闻学”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这里所讲的“战时新闻学”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年代,我国新闻学界、业界的精英们对新闻事业所进行的“工具理性式”的思考与研究。正如当时学者任毕明在《战时新闻学》一书所指出的:“战时新闻学,是反抗侵略压迫

而斗争的战争工具”。^[16] 基于这种“工具理性”的思考,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界所建立起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抗战时期,开始让位于“新闻工具主义”。人们视新闻为武器,认为“在抗日战争这场空前惨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新闻传播者手中最好的战斗武器,就是新闻本身”。^[17] 在这种新闻核心理念的指导下,抗战时期的新闻学界就兴起了对战时新闻学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战时新闻学研究的著述,这种研究既在学术上为战时新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学理依据,又在业务上为战时新闻与宣传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近年来,有关战时新闻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如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中单列“战时新闻学的兴起”一节对战时新闻学进行了专题研究;张育仁的《论战时新闻学与战时新闻政策的特殊关系》、《论战时新闻学的核心理念及新闻武器论的特殊意义》等论文均为研究战时新闻学的力作。从这些著述、论文所引用的主要文献资料来看,均以抗战时期出版的新闻学著作为主,基本上没有利用《战时记者》这份抗战时期的新闻学专业刊物。笔者以为,《战时记者》是研究战时新闻学的“富矿”,它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材料,通过这些材料将可进一步拓展战时新闻学研究的新视域。譬如:(1)战时的新闻政策与新闻国营论;(2)战时舆论与战争的关系;(3)战时新闻工作者的任务与神圣职责;(4)战时报人的精神与道德;(5)战时的新闻题材与报道特性;(6)战时“中国本位的”新闻教育;(7)战时新闻学的健全与发展前景;(8)战时报刊的普及与民众媒介素养的提升,等等。所有这些研究方向的拓展,都有助于战时新闻学研究的深入。

其三,《战时记者》是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学者的宝贵史料。前述已备,在《战时记者》的作者与编辑中活跃着一大批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学名家。在以“革命化范式”为主导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中,这些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学者往往因其政治立场的对立而被忽视。但是,作为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新闻史,我们没有理由漠视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而让其继续淹没在历史的封尘中。譬如,在《战时记者》的作者群中有一些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副教授,如赵君豪、王文彬、赵敏恒、祝秀侠、王研石等,有的后来还成为复旦新闻系的系主任,如程沧波。如果我们研究民国时期复旦大学的新闻学者,《战时记者》所刊载的他们的文章,就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另外,《战时记者》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的刊物,因此在它的作者中有许多是站在中共一边,或同情中共的新闻工作者,如郭沫若、恽逸群、胡愈之、范长江等,积极组织并参加了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战时记者》发表的文章同样也是研究这些人物的宝贵史料。

其四,《战时记者》也是研究抗战时期“媒介生态”的重要文献。这里所说的“媒介生态”,指的是媒介在社会中的生存或存在的状况。翻开《战时记者》,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文章反映了当时社会各方的报刊在抗战时期的存在状况,既有国统区、边区媒介的状况,也有沦陷区日伪报刊的状况,同时也有出于宣传目的,揭露日本在军国主义统治下媒介的生存状况。譬如,鵬《让我们自己来检讨一下》一文检讨了抗战一年来国统区新闻工作所存在的问题。文章指出“自抗战以来国内已无发行五万以上的日报”,报纸“量的贫乏”,使得“每天能举着报纸读的人太少”。至于前方将士们,“简直连一月前的废报也高兴读”。所以,作者首先检讨了当时“新闻工作未曾配合抗战的需要”,新闻事业“尚未能踏实负起全面抗战中的宣传责任”。其次,作者揭示了当时报纸“报道方面还不够忠实”。“摊开过去一年的报纸来看,所有报道战况的消息,尽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绩”,“除了少数战地通讯中真能暴露事实外,其余的战讯,可以说是向读者们撒了许多谎”。同时,作者赞扬了中央通讯社为抗战新闻事业“尽了莫大的力”,使得“战时的新闻纸还能维持的相当的数量”。文章还特别表扬了“中央社派在前方工作的同业”,“在万分困难中采消息,在枪林弹雨中采战讯”,他们与“在前方战壕中战士一样”,都是肩负着极大民族责任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后方民众无从得到前线的消息,许多新闻纸也要受到莫大的影响”。^[18]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抗战一年来国统区媒介生态的真实反映。

总之，随着《战时记者》拂去历史的封尘，我们看到了该刊对于抗战时期我国新闻事业与战时新闻学研究的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 黄绍竑. 黄绍竑回忆录 [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146.

[2] 王文科，张扣林. 浙江新闻史 [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71.

[3] 孟锦华. 抗战三年来浙江新闻事业概况 [J]. 战时记者，1940（10）：12.

[4] 钱震. 抗战中的报纸 [J]. 战时记者，1938（1）：5.

[5] 杜绍文. 记者节与反侵略 [J]. 战时记者，1938（1）：2.

[6] 编者. 致读者 [J]. 战时记者，1941（6）：3.

[7] 编者. 致读者 [J]. 战时记者，1940（6、7、8 合刊）：3.

[8] 本刊同人. 二卷献辞 [J]. 战时记者，1939（1）：2.

[9] 编者. 本刊重要启事 [J]. 战时记者，1940（6、7、8 合刊）：17.

[10] 金辉. 汪远涵与《东南日报》[N]. 温州都市报，2012-01-05（B16）.

[11] 编者. 征稿简则 [J]. 战时记者，1938（1）：32.

[12] 编者. 好消息 [J]. 战时记者，1939（8）：15.

[13] 编者. “集纳”一得 [J]. 战时记者，1938（4）：24.

[14] 毛子明. 昆明文化报道 [J]. 战时记者，1940（10）：9.

[15] 编者. 我们来一个“新的开始” [J]. 战时记者，1938（4）：12.

[16] 任毕明. 战时新闻学 [M]. 上海：光明书局，1938：4.

[17] 张育仁. 论战时新闻学的核心理念及新闻武器论的特殊意义 [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3）：1.

[18] 鹏. 让我们自己来检讨一下 [J]. 战时记者，1938（1）：2.